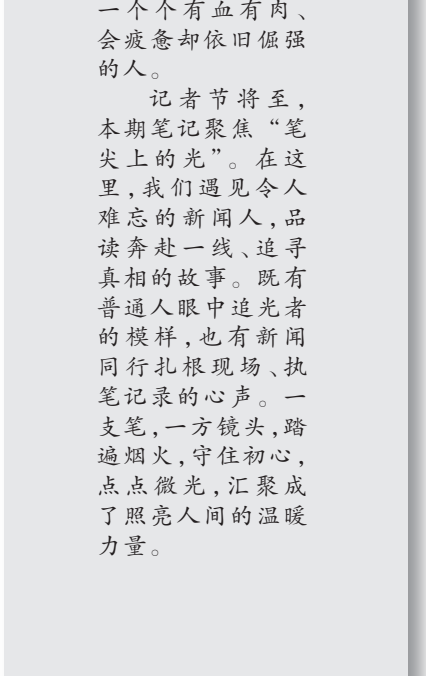
笔尖上的光

夜深了，台灯依旧亮着。桌角的采访本上，密密麻麻记着人名、日期与采访提纲。小时候，记者是报纸上的“本报记者”，是电视里字正腔圆播报新闻的身影。长大后才懂得，每一篇新闻背后，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、会疲惫却依旧倔强的人。

记者节将至，本期笔记聚焦“笔尖上的光”。在这里，我们遇见令人难忘的新闻人，品读奔赴一线、追寻真相的故事。既有普通人眼中追光者的模样，也有新闻同行扎根现场、执笔记录的心声。一支笔，一方镜头，踏遍烟火，守住初心，点点微光，汇聚成了照亮人间的温暖力量。



把光传递下去

■张 涵

三个月前，我成为了一名记者。

从前印象里的记者，是在大风里播报新闻、整个人快被吹跑的样子；是电视镜头前衣冠楚楚、坐在会议桌边提问的样子。真成了记者，最先学会的却是这一句话——“您好，我是记者小张。”

这句话像一把钥匙。它带我找到藏在花卉基地深处的乡村咖啡店，也带我探秘新兵役前训练场，还带我走进敬老院，看到智能化养老把老人照料得舒舒服服。

第一次跟着同事采访，就撞上了台风。

车停在石路村口，雨横着抽过来。我撑伞，伞“啪”的一声，伞骨歪到了一边。同事把伞一收，冲我喊：“别管伞了，先采访！”

田里水很高。村干部和志愿者赤着脚，裤腿卷到大腿根，弯腰拔姜、放姜，每一步都在跟时间赛跑。村党委委员站在田埂上打电话，声音被风扯得断断续续：“企业食堂要多少量，超市要不要，这两天必须卖掉，不然就坏了……”

一筐又一筐生姜从泥里递出来。我站在一旁，采访本湿了一半，字迹晕开，像一朵朵小墨花。那天我记住了：新闻有时候不是“问”出来的，是从泥里一筐一筐“递”出来的。

第二个月，我开始独自采访。

有一次跟随爱心人士去给独居老人送重阳礼包。门敲开，老人怔了一下，接过东西时眼眶就红了，连声道谢：“你们能来，我就很开心了。”那份惊喜和感动藏也藏不住。

回去路上，采访对象和我说起，这事已坚持了十多年。起初是她一个人，后来一双手变成许多双手，打包的、走访的、捐物资的，越来越多。

我走在旁边听着，忽然觉得那袋礼包不只是礼包。善意这东西，有人先伸了手，就会有人跟着伸。

而我记下这些、写下这些，大约也是在递——把一个人的善举递出去，让更多人看见，让更多人愿意伸手。

今年国庆，我去了平湖书场，听说那儿有连续半个月的长篇铍子书表演。

78岁的戎永鑫站在台上，铍子一响，像有人往空气里撒了一把脆豆子。台下听众个个眼神专注，有人轻声跟唱，有人举手机录，有人在本子上记词。他在台上中气十足，手一抬，满场安静。

后台采访，他才说，这场长篇他准备了好几个月。因为年纪大了，他已经很久没上台。每天在家里对着镜子背词、练腔，词一页页压在茶杯底下。“我怕忘词，更怕辜负台下这些人。”

我问一位常来听书的阿姨为什么爱听。她说：“听了几十年。戎老师一开口，就像回到年轻时候。”她还说，自己一直在写铍子书，“老一辈传下来的好东西可不能断了。”

临走时，戎永鑫先生告诉我，之后大概不会再演这么长的铍子书了。我站在书场门口，忽然觉得很荣幸——这场他准备许久的长篇，我赶上了。

三个月，数不清的场景。他们不是夸张的大词，是具体的汗、具体的感动、具体的一双手。

而我握着采访本站在他们中间，才慢慢明白：记者这个工作，不只是记录。是把善意递出去，让更多人愿意伸手；是把文化传出去，让更多人听见铍子响；是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光，往亮处挪一挪。

好文字，是走出来的

■薛守瑞

我是一名大学语文老师，日常大半时间都守着讲台和书本。我和文字打交道，大多是带着学生啃课文、斟酌词句，谈章法、品意境。很少踏足新闻现场，直到认识记者老周，我才慢慢读懂，文字除了书卷里的文雅，还有一份踩在泥土里的分量。

和老周相识，是几年前一场地方文化座谈会。会场里不少人都在谈方案、讲亮点，话都说得周全漂亮。只有他安安静静坐在边上，本子摊在膝头，笔一直没歇。散场闲聊我才知道，他来这儿，不是摘抄会上的表态，是想打听老街里几位老手艺人的住址。他说，材料上写的都是梗概，老人随口聊出来的过往，才是活的故事。

后来有空，我跟着他去过一趟老城深巷。那条路我上下班经常路过，青砖老房，墙皮一块块剥落，在我眼里，不过是一处寻常旧风景。老周不一样，提前做了功课，谁家还守着老手艺，老人性子内向还是健谈，心里都有数。那天日头很晒，巷子里没有遮阴的地方，他不急着掏录音笔提问，先拉过小板凳，挨着老师傅坐下，陪着喝茶唠家常。

我在一旁看着，心里还暗暗着急，想着早点问完提纲上的问题，好回去整理。老周悄悄跟我摆手，让我别急。他说，人愿意把心里话讲出来，不是因为你打开了录音设备，是先放下身份，好好听。那些最动人的细节，往往都是闲聊时不经意冒出来的，不在提前写好的提纲里。

那天聊到天色擦黑我们才动身返程。车上，他趁着记忆还新鲜，一边回放录音，一边往本子上补细节。我问他，就一篇写老街普通人的稿子，反反复复跑两三趟，值得吗？他笑着回我，你们语文老师教学生作文要真诚，我们做记者，根子上也是求真。文学文字可以润色铺陈，新闻不行，差一点点，故事就偏了。

我常在夜里刷到他发出来的稿件。大多不是什么轰动的热点，有时讲农户一年的收成，有时记录社区居民的烦心事。有一回他写了一位独居老人的处境，文章登出来之后，不少热心读者看到，主动上门搭把手。我跟他说，这篇稿子反响很好。他倒是淡然，说自己只是原原本本记下老人的话，不敢添油加醋，更不敢刻意煽情。手里这支笔，不能辜负愿意信任他、对他敞开心扉的人。

上课的时候，我偶尔会跟班里学生说起老周。很多同学以为写作就是堆砌辞藻、打磨文采，以为记者就是对着镜头侃侃而谈。我借着老周的经历跟他们讲，还有一种写作，得迈开步子走进现场，学会克制自己的想法，把话语权交给故事里的普通人。不少学生听完才明白，好文字背后，藏着赶路、等候和体谅。

教书久了，我习惯待在安稳的教室里，隔着纸页和文字对话。老周的文字，却是一步一步跑出来的。刮风下雨，只要约好了采访对象，背包一拎就出发。采访也不会次次顺利，有人不愿多说，有些线索要反复核对，一篇稿子改上四五遍是常有的事。他偶尔也找我吐槽，跑一天下来腰酸腿疼，改稿到深夜的时候也会觉得疲惫。可休整不了多久，接到新线索，又动身去下一个地方。

现在信息铺天盖地，大家刷消息都追求快，愿意沉下心求证、耐心倾听的人，好像越来越少。我常常感慨，也正是这样，老周这样的记录者才格外珍贵。他不追流量，不博噱头，就凭着一股朴素的诚意，安安静静把小人物的声音传递出去。

记者节快要到了。想起老周，想起许许多多和他一样奔走在烟火人间的记者。他们的光，不在聚光灯底下，藏在写得密密麻麻的采访本里，藏在一趟趟奔赴现场的路上。

一个字的旁边

■贾 莹

做记者这些年，用掉了多少本采访本，我一直没有数过。用完的都塞在书柜最底下那一格，横的竖的摞在一起，有的封皮掉了，有的让雨淋过，纸页起了皱，翻开来字倒还认得。前几天收拾柜子，抽出几本随手翻了翻，里头记的多半是人名、电话和村子的名字，再就是一些数字，几亩地，几户人家。当时写得急，现在再看，有好些地方得辨认半天，才想得起是哪一年、在哪儿记下的。

有一本的中间夹着一张汽车票，是几年前冬天去一个村子的。那一趟是去写村里通自来水的事，车票上印着的票价是二十几块钱，具体多少，票面磨得看不清了。那天在村里转了大半天，见了七八个人，其中有一位老人，七十多岁，家就在半山坡上，院子里的水窖已经封了口，上面压着几块石板。他说以前一家人吃水全靠这口窖，夏天下雨的时候接，接满了能吃到开春，赶上旱年接不满，就得赶着驴去沟里驮。我问他贵姓，他说姓禄，我听成了陆地的陆，就在本子上写了个“陆”字。

回来写稿，写到他那一段，我停下来想了一会儿。当时院子里风大，他口音又重，我其实没太听真，问的时候也没让他写给我看。这种事说大不大，可报纸印出去，名字就是那个样子了，他认得字也好，不认得字也好，总归是他的名字。我翻出采访时留的电话，是村里一个年轻人的，打过去没人接，晚上又打了两回，还是没人接。稿子第二天就要交，我想过干脆把名字去掉，只写“一位老人”，可这一段的话都是他说的，去掉了名字，读起来就像是我自己编出来的一样。

第二天上午电话总算打通了。那个年轻人说他在县城，晚上回村里帮我问。到了下午四点多他回了个电话，说问过了，是福禄的禄，示字旁那个。我把稿子里的“陆”改了，又在采访本那一页的“陆”字旁边，拿笔补了一个“禄”。那一页上到现在还是两个字并排写着，前面那个我也没顾上划掉。

这样的事，干这一行的人大概都碰到过不少。人名、地名、数字，最容易出错，也最经不起错。我刚进报社的时候，带我的老编辑看稿子，头一遍先不看写得好不好，拿着笔一个一个圈人名和数字，圈完了一个一个问我，这个是谁说的，那个是从哪儿来的。我那时候嫌他啰嗦，有些问题答不上来，就只好再去打电话问。后来自己写的年头长了，慢慢地也养成了这个习惯，稿子写完先过一遍名字，有拿不准的，宁可多打几个电话。

白天在外头跑，稿子多半是晚上写的。有时候写到后半夜，楼下的路灯都灭了，再打电话核实一个数字就不合适了，只好先在稿子里做个记号，第二天一早再问。也有问了还是说不清楚的，这个人说是三十户，那个人说是三十来户，我就照着说得少的那个写，再加一个“约”字。这些地方读者大多不会留意，一篇稿子印出来，看的人记住的是事情，很少有人去数里头的户数对不对。可要是真写错了，见报第二天，电话多半就打到报社来了，打电话的有时候是本人，有时候是他家里的晚辈。

那位姓禄的老人，稿子见报以后我再没有见过。听那个年轻人说，村里的自来水当年秋天就通了，老人家的水窖后来也没再用，上面的石板一直压着。这些都是电话里听说的，我没有再去过那个村子。

儿子小时候翻过我的采访本，说里头的字写得比他的还难看。他说的也是实话。书柜底下那一格已经塞不进去了，前天又用完一本，暂时先放在桌上，等周末去买个纸箱来装。

难以忘怀的采访

■陈正其

我在平湖广播电台工作的三十多年里，始终坚守采访一线。如今回望那些岁月，许多往事历历在目，其中对三位人物的采访，至今令我难以忘怀。

第一位是钟埭的陆凤英，她的拥军事迹让我深受感动。1995年八一前夕，我得知她要去驻乍浦部队慰问，便立即前往采访。到她家时，她正为雷达连一名战士举办婚礼，场面隆重如自家子女出嫁。我临时决定深入挖掘，写下长篇通讯。

1991年建军节，陆凤英随女儿参加军民联欢，被战士们的辛劳打动，从此踏上拥军之路。她常邀战士到家中做客，安徽籍战士小闵因想家被她多次邀请，渐渐称她为“陆妈妈”。每年退伍前，战士们总来告别，抢着做饭、打扫，依依惜别。一位战士临行时跪地含泪说：“妈妈，四年来我来过11次，您家没添一件像样东西，却对我们如此慷慨，我一生不忘。”那一夜，陆凤英泪流半宿。

我写下《拥军之家》，先刊于《平湖报》，后应《嘉兴日报》之约修改为《一对普通农村夫妇的拥军情怀》，整版刊登。报道引发广泛关注，人武部、民政局高度重视，南京军区、中央电台、央视相继报道。1997年，陆凤英获评全国拥军优属模范个人，事迹登上《焦点访谈》。而她始终朴实如初，默默续写拥军篇章。

第二位是去台老兵吴阿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在市政协会议名单上注意到这个名字——一位从台湾归来的老兵。会后，我与同事前往村里采访。

吴阿顺1949年被抽壮丁，告别妻子二宝和一双儿女，一去四十余年。在台湾，他日日思乡，与战友抱头痛哭，夜夜盼着能早日回到亲人身旁。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，他终于通过书信得知妻儿安好，于1989年经香港回到家乡。

采访从一顿午饭开始。他讲述离别那天的早饭，妻子哭干了眼泪。而他的妻子一句“我等了他四十年”，让我当场落泪。我们决定以“叶落归根”为题，副标题为“平湖农村一个穿越四十年的爱情故事”，将政治悲欢融入情感主线，避开敏感话题。报道在平湖电台播出后，被《南湖晚报》转载。

第三位是新仓镇的费玉良。我三次采访他，见证了他从贫困到重生的全过程。

第一次见他时，他因病致贫，债台高筑，精神萎靡，问一句答一句。我深感同情，却无力相助，只叮嘱村干部要多扶持。

几年后，听说镇干部老徐与他结对帮扶。老徐是科技致富带头人，手把手教他种大棚小西瓜。台风来袭时，老徐先保他的瓜棚，自家却损失惨重。第二次采访，费玉良话多了，满脸感激，一再让我写写老徐。

又过几年，我听说他翻建新房，便再次前往。他带我参观新居，笑着说：“是老徐帮我重拾信心，还清债务，还攒下9万元盖了这房。”我写下《走过去前面是个天》，借用当时热播剧主题曲名，贴切表达他的蜕变。稿件被《浙江农村信息报》头版头条刊登，题目改为《走过去前面是个艳阳天》。

后来，费玉良获评省级科技示范户，住进了更大的房子。采访他的记者越来越多，级别也越来越高。或许他已不记得我，但我始终记得那个从绝望中走出来的身影。

三十年光阴流转，三位普通人的故事，却在我心中愈发清晰。他们用坚韧、温情与希望，诠释了最真实的人间烟火，也让我深刻体会到新闻工作的意义——记录平凡中的不凡，传递沉默中的力量。

第一个到现场的人

■潘国武

大型活动公众开放日前一天，方主任把一沓策划方案摊在桌上，翻到中间一页，用手指敲了敲纸面：“采访第一个到公众开放日现场的人。”部门二十多名记者纷纷举手，这个任务最后落到了我的身上。

方主任看向我：“你知道这次采访要注意什么？”

“我必须第一个赶到现场。”

他抬眼望着我：“还有呢？”

“我要问问这名观众从哪里来、为什么早早赶来，挖掘他背后的故事：从事什么工作，有没有参加过同类活动，此行有什么打算。”

方主任笑着点头。

第二天凌晨五点，闹钟准时响起。我赶往活动现场时，天边才刚泛起鱼肚白。空旷的广场上不见人影，我选了正对台阶的位置坐下，摊开采访本，时刻留意四周。

没过多久，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打破了寂静。广场停车场里停着几辆小车，我当时并没有多想。

将近六点，一名男子从侧面台阶走进广场，舒展着身子。我连忙拿着采访本迎上去。

男子笑着招手：“没想到，你来得比我还早。”得知我的来意，他有些意外：“我还以为记者都是扛相机的呢。”

他是外地一家公司的技术员，今年公司没有参展，领导看到活动报道后，安排他提前过来，为明年参展探路。

采访结束后，我回报社赶写稿件。文章刊发当天，得到了领导肯定，我便照常跑新闻，渐渐把这件事放在了脑后。

直到某天下午，办公室通知开会，要求带上那一期报道公众开放日的报纸。走进会议室，方主任和几位领导已经落座，每个人面前都放着这份报纸。我摊开报纸逐字重读，手心慢慢冒出冷汗，心里忐忑不安，难道稿子出了差错？

听着领导们的交谈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天是我的见习期满评议会。

轮到方主任发言，他翻开报纸看向我：“当初安排你采访这个选题，知道是为什么吗？”

我攥着圆珠笔，一时无言。

“凌晨那个时段，人最容易松懈偷懒，我就是想看一看，你会不会真的奔赴现场。”

我脱口而出：“那时候广场上，只有我和露水。”

方主任微微蹙眉：“那你看看这篇稿子，有没有问题？”

我翻出当天原始采访记录，仔细对照，摇了摇头。

“你稿件里写的那个人，并不是第一个到现场的。”

我一愣：“我确实是最早到的记者，但我不能写自己。”

方主任轻轻叩了叩桌面：“我才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人。”

圆珠笔“啪”地掉落在地上。我怔住了：“原来您早就待在小轿车里？”

“四点多就到了，在车里坐了两个多小时，外面的动静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当时那声喇叭，原来是您按的！我还以为是车辆警报，没有多想。”

“我按喇叭，就是提醒你我比你更早到场，不然现在说出来，你未必相信。”

会议室里只剩下空调低沉的嗡鸣。

“你和我，都比他来得更早，但我们都不能是报道里的那个群众。值得落笔记录的，是他。”方主任端起茶杯抿了一口。

我弯腰拾起笔，把这句话认真记进采访本。

方主任的目光落在报纸上：“这次采访，如果喊上摄影记者，配上一张现场照片，版面效果会更好。”

说完，他拿起笔，在我的见习鉴定意见栏写下四个字：同意转正。

我收好采访本，纸页边角，还留着那天清晨露水浸润过的痕迹。

下期话题

近来，“淡淡的就会顺顺的”这句话在网络上被热议。

放下过度的期待，少一点焦虑内耗，慢慢感受、好好生活。幸福未必是盛大的惊喜，更多散落在日复一日的平凡里：一餐热饭、一阵晚风、一次从容的漫步，一段舒服自在的相处。淡，是心态；顺，是生活回馈给我们的温柔。

《城市·笔记》开启特别征集，以“淡淡的就会顺顺的”为引，邀你落笔。记录下日常里的松弛与暖意，书写烟火小事、岁月感悟、相逢与别离，写下你理解的这份“淡”与“顺”。让文字留住细碎微光，分享属于你的生活答案。

征稿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16日，字数1100-1400字，投稿邮箱为pinghubs@vip.163.com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。